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出版体制的一点思考

向 新 阳

在我国出版改革的进程中,应当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符合出版规律的出版体制。建立新的出版体制,突出出版的本质特征,强调出版必须以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更有利于坚持贯彻社会主义出版方针,将更有力地推进整个出版事业的“阶段性转移”,从而保障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目前,无论是出版理论界,还是出版实践部门,都共同关注着一个焦点:出版体制改革。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即从以数量规模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的时期。既是“转移”,而不是定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体制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都还有待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完善。但是,宏观的思路和基本的方针已经有关部门确定,这就是在由数量规模向优质高效的整个转移阶段,逐步建立起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又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并且符合出版规律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新体制。这三个方面,是构成这一新体制的三个要素,并被认为是这一新的体制处于最佳运作状态的三个标志。它们依次排列,相互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关于出版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出版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门,也不能例外,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只有审时度势,顺乎潮流,出版事业才有可靠的社会保障和良好的物质基础,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与繁荣;否则,出版事业将因失去市场活力而萎缩,出版改革的构想也会因为没有经济基础而成为海市蜃楼。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之一。作为文化教育和思想意识的重要阵地,出版事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负有崇高的历史使命。可以说,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

我国新的出版体制的思想内核和灵魂所在。只有坚持这一条,我们才能通过出版最大限度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改革、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才能有力地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才能帮助广大群众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正确的价值观,以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总之,才能完成“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①的重大历史使命,真正实现出版的社会价值,并显示其文化意义。否则,我们的出版业很可能完全沉溺于市场,并被商品主义的原则所左右。在市场的诱惑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制黄贩黄、非法印刷、买卖书号和剽窃盗版等等现象,造成了文化市场一定程度的混乱,同时也给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种种损失,这个严重的教训必须牢牢记取。为了避免出现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已明确指出:“出版物是特殊商品,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去调节”^②。这一论断,不只揭示了出版业和出版物的本质属性,而且揭示了构成新的出版体制中前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最后,社会主义出版新体制必须符合出版规律。出版工作是一项自成系统的社会文化工程,既涉及文化生产过程中的信息筛选和优化,又涉及文化传播活动中的信息传递和共享,有其特殊的矛盾运动形式和运动规律,具有过程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的特点;同时,出版总体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并表现出严格的程序性和规律性的特点。出版活动既不同于政治活动,更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与一般的社会文化活动也有不同之处。它是一项横亘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大范畴、跨越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个领域的特殊的社会文化活动,要求精神生产的个人自由与其产品社会化(得到社会的认同并为社会所接受)的统一。这是出版的特殊“个性”,也是出版规律的基本内容。出版规律是出版体制不断发展完善的内在驱动力,它一旦与适当的外部条件相联系,就能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如果违背了这个规律,无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出版提供怎样良好的条件,也不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出版提出怎样迫切的要求,都不能保证出版体制的正常运作,也就等于取消了出版体制本身。

我们对构成新的出版体制的三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作了以上简要的分析说明。可以看出,关于出版体制改革的宏观思路和基本方针是明确的,其内容也是丰富的。同时,它在动员出版界实行“阶段性转移”、探索建立新的出版体制方面,正在起着并将继续发挥指导性的作用。

但是,笔者想起了英国的约翰·巴洛兹在《文艺的本质与形式》中打过的一个比喻,以说明语言的组织排列对决定语言艺术程度高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说:“一颗宝石跟一块普通石头的区别并不在于本质,而是在于分子的排列——结晶的方式。木炭和金刚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在外观和效用,它们的差别可多远啊!珍珠所含的成分,没有一种是不能在最粗糙的蚌壳中找到的。两人有着同样的思想,他们用差不多相同的语言来表现它们,然而一个人的作品是真正的文字,另一个人却是平凡陈腐的东西。”系统论的观点也同样认为,系统结构要素的排列方式及其相互关系,对系统本身也有着至关重要的质的意义。由此,笔者认为,在探讨建立社会主义出版新体制的宏观思路时,可以对它作出如下表述:a. 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b.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c. 符合出版自身的规律。

为什么要对这三项要素中的前两项调换其排列次序呢？变动虽然不大，但这决不是一种玩积木式的语言游戏，而是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这样排列更加强调了出版必须以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所谓出版，就是以物质生产的手段，生产复制精神产品，以便向公众传播。要求出版体制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强调出版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都是由出版的直接成果——出版物的精神产品属性决定的。这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的随意宣泄，而是作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质的规定性的表现。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出版的历史责任，不仅在于传播知识，传递信息，它的更崇高的使命，还在于参与文化建设，并引导和促进反映整个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思想潮流的产生和发展。这就要求新的出版体制具有广阔的文化背景、深邃的文化视野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是面对 21 世纪，面对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的“第三次浪潮”，出版更不能不始终保持它应有的文化品位，更不能不时刻显示出版文化所特有的文化个性。社会主义出版体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的适应，正是保证其文化品位和文化个性的必由之路，也是保证出版实现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的必然途径。把出版体制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放在首位，与把出版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正相呼应，这样，从体制上树立起社会效益第一的标准，更能增强人们的“第一”的和“首位”的意识。

第二，这样排列更能突出出版的本质特征。尽管出版涉及到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但它在本质上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这是因为参与出版的主体——人，所从事的主要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参与出版的主要客体——著作稿，是著作者的精神劳动成果；而主体与客体通过认识和实践关系所产生的成果——出版物，是一种以物质外壳承载的精神产品。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或者主客体的结合，都在本质上“摆脱”了物质的纠缠，而显现出精神的特性。出版本身既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又为民族文化其他门类的生产赋予为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形式。当这些具有物质外壳的精神产品进入市场、参与流通时，出版物的商品属性也就随之显现出来。但出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和文化、教育等门类一样，既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要求新出版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正是受出版和市场经济的这种辩证关系的决定而提出来的，也是由出版物的商品性提出来的。需要说明的是，在现代社会，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不可能丰富和发展，并将导致文化的“沙化”；反过来，没有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底蕴，经济的发展不会持久，并且必然走向畸形和萎缩。但是，出版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人，通过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并以此支配人的社会实践，间接发生作用。同时，还应当说明，出版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一回事。出版体制的终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而市场经济体制，主要包括经济活动中的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资源配置以及优胜劣汰等等，其最高宗旨是尽可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求。

第三，这样排列更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出版方针。诚然，无论新的出版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还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都体现了出版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精神。但是，就出版这种文化现象而言，它首先是以文化建设参与者的角色，从文化的层面，用文化的手段，来履行它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崇高职责。出版所承担的任务，无论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传播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或是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围。坚

持社会主义出版方针,首先就是要坚持出版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并使出版事业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对新的出版体制系统结构要素的排列进行了调整。我们自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摆在首位,就表明在出版的神圣阵地上,树起了“利润高于一切”的旗帜——当然不能这样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但我们似乎也不应当忘记英国著名出版家斯坦利·安文的一个忠告:“如果赚钱是你的第一目标,你就别干出版这一行。”^③

第四,这样排列能更有力地推进“阶段性转移”。变数量规模为优质高效,质而言之,就是由数量向质量转移。质量被提到了首位,因为它是出版物的生命,是整个出版事业的生命,也是衡量“阶段性转移”是否实现的标志。“转移”转向何处?目标何在?回答是:优质高效,多出精品。影响质量的因素多种多样,提高质量的措施各不相同,衡量的标准也不全然一样。满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程度的高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效益的大小,同时决定了出版质量的优劣。但首要的是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只有那些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能够传播人类文明成果以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杰作佳构,才是时代的精品,才是群众最需要的优质精神食粮。我们认为,出版质量包括编辑质量、印制质量和发行质量三个要素。编辑质量,尤其是其中的思想内容质量,是出版质量的基本核心,印制质量是出版质量的外在形式,而发行质量是实现整个出版质量社会文化价值的根本保证。向优质高效阶段转移,就是要全面提高出版质量。良好的出版质量,是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刺激文化消费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数量规模急剧膨胀的日子里,一些人一手高擎着“读者就是上帝”的大旗,一手却干着不惜降低出版质量以牟取暴利的营生。出版质量在他们手中成了一团可以任意挤捏的面团。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出版资源的巨大浪费,极大地妨害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严重地制约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由此可见,强调出版体制首先必须适应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把出版物的思想内容质量摆在第一位,不但不会削弱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程度,反而会克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可能给出版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力地推动“阶段性转移”更迅速地进展。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第五,这样排列有利于加强出版队伍建设。人是出版活动的主体,是决定出版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就作品和作者的关系而言,可以说“文如其人”;就出版物和编辑出版工作者的关系而言,可能说“书如其人”。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人的素质。“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改善全体公民的素质,必将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使人和人之间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型关系不断发展,使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④它同样也是出版事业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是因为编辑出版工作者的素质,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修养,尤其是精神文明的程度,对编辑出版劳动的全过程有着直接的决定性影响,既决定着对劳动对象(主要指原稿)的认识,也影响到改造认知对象的结果。应该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出版业迅猛发展,规模数量大幅度增长,出版队伍特别是骨干力量的培养和管理相对滞后,大批人员的素质与整个出版形势的要求不能完全适应,影响了出版质量效益的提高。这就要求花大力气,从根本上加强出版队伍建设。特别是在“阶段性转移”时期,成绩和问题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在这种情况下,尤有必要强调出版队伍必须具备高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素质。否则,在意识形态与物质利益、精神支柱与市场空间、道德品

质与金钱诱惑之间，就会表现出严重的倾斜，乃至完全背离前者而沉溺于后者。利用出版，污染社会，造成公害，进行特殊的社会犯罪和经济犯罪，就是一个突出表现。文化导向与市场导向的悖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给更多的编辑出版工作者带来了尴尬和困惑。消除犯罪，摆脱困惑，更加迫切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精神文明，就是树人，就是提高人的素质。要用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原则规范出版队伍，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手段建设出版队伍。出版工作者是教育者，教育者应先受教育。建设精神文明，须从自身开始。否则，无论有怎样完善的体制，他都可能想对策、钻空子、打“擦边球”。多年来，关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议论颇多。但往往是说起来振振有词，孰先孰后都知道；做起来却偃旗息鼓，将两者位置暗暗颠倒。“两个效益”的关系问题，是在出版由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出版物的商品属性被认识、出版业开始成为信息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的提出，揭示了我国出版观念的深刻变化，是中国出版文化的一大发展和进步。但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不能采取双重的标准：社会效益——全局的，经济效益——局部的；社会效益——长远的，经济效益——眼前的；社会效益——精神的，经济效益——物质的。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详细阐述，当另有专文。但必须认识到：真正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出版物，即使一时不能让出版单位赢利，一种隐形的更为巨大的经济效益却往往形成，这是因为从宏观上来说，良好的社会效益可以向经济效益转化。出版单位的物质财富可能一时少了，社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却同时增加了，这是值得的。我们的出版工作者应该有这种眼光，有这个胸怀。

写到这里，又该回到约翰·巴洛兹说过的那个比喻了。那只不过是一个比喻而已，而比喻总是蹩脚的；但黑格尔老人又说过，比喻就是“尽量在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之中找出相关联的特征，从而把相隔最远的东西出人意料地结合在一起”^⑤。我们能不能从宝石与石头、木炭与金刚钻、珍珠与蚌壳的分子排列不同中，找出一点与建立新的出版体制“相关联的特征”，进行出人意料的“结合”，从而受到一些启示、引发一些思考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注 释：

- ①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新闻出版报》1994年1月26日第1版。
- ② 《贯彻中央指示 加强出版工作》，见《新闻出版报》1995年1月20日第1版。
- ③ 斯坦利·安文：《出版概论》，书海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247页。
- ④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见《人民日报》1986年9月29日第1版。
- ⑤ 黑格尔：《美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2页。

（责任编辑 江 平）